

**Contribution of Gardens
to City Life and Culture**

■ [法] 米歇尔·柯南 主编
■ [中] 陈望衡

城市与园林

——园林对城市生活和文化的贡献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Contribution of Gardens
to City Life and Culture**

■ [法] 米歇尔·柯南
■ [中] 陈望衡

主编

城市与园林

——园林对城市生活和文化的贡献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与园林:园林对城市生活和文化的贡献/(法)米歇尔·柯南,陈望衡主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10

ISBN 7-307-05235-0

I. 城… II. ①米… ②陈… III. 城市—园林艺术—研究
IV. TU98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6122 号

责任编辑:朱凌云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杜 枚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980 1/16 印张:24.5 字数:352千字 插页:1

版次: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307-05235-0/TU·64 定价:40.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导 言

城市园林,交流与文化 [法]米歇尔·柯南 [中]陈望衡(1)

园林对城市生活的历史贡献

公元 1 世纪的庞培花园和花园生活

..... [美]威廉敏娜·雅舍姆斯克(18)

洛阳园林:城市文化的精华 [法]乔治·梅泰理(46)

奇观、仪式、社会关系:北宋御苑中的天子、子民

和空间建构 [美]奚如谷(61)

明江南的城市园林

——以王世贞的散文为视角 [美]肯尼斯·J. 哈蒙德(82)

中国古典园林的美学精神 [中]陈望衡(98)

热那亚园林:政治与娱乐的结合 [意]劳诺·玛格兰尼(108)

皇家花园与巴黎的城市生活(1643~1789 年)

..... [法]米歇尔·柯南(141)

18 世纪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园林社交 [美]席琳·哈马德(161)

维也纳彼德麦式园林与中产阶级身份的自我塑造

..... [美]罗伯特·罗滕博格(183)

公园、园林大道与市郊社区:福雷德里

克·劳·奥姆斯特德和现代大都市 …… [美]大卫·斯凯勒(201)

现代城市中的园林

20 世纪中期的瑞典梦想——公园设计

作为社会进步的工具 …… [瑞典]托布约恩·安德森(226)

园林城市:美国新城镇与景观规划

…………… [美]尼可拉斯·达根·布鲁姆(258)

北京:迷失于转型之中? …… [美]埃里克·J. 赫吉拉(285)

马拉克奇:一个生态学的奇迹及它的惨遭破坏(1071~2000 年)

…………… [摩洛哥]穆罕默德-埃-法耶兹(307)

作为文化记忆的苏州园林(11~19 世纪) …… [澳]许亦农(323)

东京的散步场所:传统的永久变革 …… [日]S. 博苏(355)

从生态学和社会经济学的维度看印度

喀拉拉邦宅园 …… [印度]U. M. 查得拉塞卡拉 S. 珊卡(381)

导 言

城市园林, 交流与文化

[法] 米歇尔·柯南 [中] 陈望衡

有人或许对这一事实感到遗憾, 即绝大多数旅游者, 即便他们非常欣赏园林, 但却几乎不去关注它们。历史学家可比为对过去进行游历的旅游者, 尽管他们有着与过去的旅游者相类似的局限, 但是他们的成果往往更为系统。与后者一样, 他们对于他们所游历的城市而言也是外来者, 而且冒着对生活在该城市园林中的市民所持有的观点进行误读的风险。然而, 他们将历史问题的某些方面重新唤醒, 并且赋予我们对于园林进行某些精确描述的特权——毕竟这些园林, 它们的功用、发展与意义, 在现今的城市之中, 尘封已久。

城市园林中的神秘氛围

为何许多旅游者当发现一座城市被园林所环绕、当这座城市具有如此众多的园林或整座城市浸浴在园林所营造的氛围中, 并以之作为城市的卓越标志时, 会大加赞叹? 是否园林所带来的幸福能够使一座城市更具有经济发展的潜力或更加具备审美的趣味? 抑或是园林传递着某些可被旅游者下意识感受到的城市生活的活泼潜质? 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 (Ibn Battuta, 1304 ~ 1368/1378? 年) 于 1344 年乘坐小船来到他称之为 Zaytun 的中国某城市。^[1] 在断定该城市必定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并盛产绸缎之后, 他作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评论: “如同中国其他的城市, 在 Zaytun 中, 每一位居住者在其住宅中央都拥有自己的田地与园

林,如同我们的斯基尔玛萨(Sijilmasa)(摩洛哥的某城市,译者注)一样,而这恰好可以解释中国城市规模如此之大的缘由。”^[2]在接下来的评论中,伊本·白图泰指出:穆斯林生活的领域相互隔离。伊本·白图泰对中国园林所具有的优越性的评论,着重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自己的兴趣与其说是关注于城市生活与园林,还不如说是关注于穆斯林宗教行为与宗教历史。1325年,伊本·白图泰曾独自一人离开自己生活的城市远赴麦加进行朝觐。^[3]他宁愿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城市生活的舒适性上,因为中国人在这些园林中的生活非常具有说服力。

伊本·白图泰在其评论中重复着这样的类似论断。“十天之后,当我们来到 Quanjanfu(现泉州附近,译者注)时,这座坐落在广袤平原上,风景优美且规模庞大的城市便映入我们的眼帘,Quanjanfu 被果园所环绕,如同勾塔绿洲(Ghouta)的大马色(Damas)……这座城市四面便是城墙……中国人就在这城墙所圈定的区域内生活:这是四座城市中最大的一座……如同我们先前所提及的,每一位居住者都有自己的园林、田地与住宅。”我们不要感到惊讶,他对于扬州的赞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我在世界上所见到的最大的一座城市:要花三天才能走完全城。扬州与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都依据相同的原则进行建造:每一名居住者都有自己的果园和住宅。”^[4]

伊本·白图泰来自摩洛哥,在他们那儿,最大的果园是阿蒙哈德王朝苏丹(某些伊斯兰国家最高元首的称呼,译者注)财富的来源(如穆罕默德·埃·法耶兹在本论文集中所论述的),因而,中国城市中这些园林就被顺理成章地比做果园,或许他更多地意指这些园林的内在含蕴,而非它们的外在表象。他游历中国的时期是中国的元朝(1279~1368年),此时的中国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伊本·白图泰明显倾向于蒙古人的统治政策,这使得他对园林的赞美有些过誉。但他为了歌颂元朝政权制度,而对所有城市中的居住者的由园林而赋予的生活进行赞美,却饶有趣味!

这并非伊本·白图泰对园林进行赞誉的唯一案例。他对大马色(Damas)中所有的园林都进行了极度的赞誉(他游历的时间是1326年)。

那里的居民在周末都会有一个令人愉悦的散步。^[5]1352年,伊本·白图泰在到达其短途旅行的终点——安达卢西亚的格拉纳达后,对那儿所拥有的富饶的果园赞赏有加。^[6]然而,中国确是他对整座城市所有园林进行高度赞誉的唯一国家,并且也是他从艺术和科学层面考察最为详尽的国家。^[7]从伊本·白图泰这里,我们能够了解到城市园林如何成为一种构成卓越成就文明的符号,尽管他不喜欢这些文化的其他方面,如宗教习俗与宗教信仰。^[8]

其他旅游者——西班牙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 ? ~ 1412年),他在就任使臣的期间曾羡慕撒玛尔罕(Samarcand)帖木耳(Timour)的王宫(1402~1406年)。^[9]而伯纳尔·帝亚治·德尔·卡斯蒂洛(Bernal Diaz del Castillo)则对Tenochtitlan(古阿兹台克首都,墨西哥城前身,译者注)的园林异常惊叹——在这些园林面前,他感到困惑,仿佛它们的建造有着不同的目的,彼此间也大为迥异。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花园的赞美似乎并非导致其对建造这些园林的人民的文化或政权的赞美。伊本·白图泰认为园林是表明中国财富的证据,他欣赏中国的园林,但并不欣赏中国的文化;克拉维约认为园林是城市卓越福利的一个构成部分,但对其所在的城市,却从一个大使惯有的冷漠的视角进行审视;而卡斯蒂洛,尽管欣赏城市园林的庄严宏大,但对阿兹台克的宗教习俗不甚认同。这似乎表明他们对园林的欣赏超越了其本身的形式和功能,以及其中所蕴含着的文化。因此,旅游者对那些拥有众多园林的城市的热情之中,似乎更加注重园林对城市福利的贡献,而不甚关心这些城市园林为何和如何改变城市居民的经济、生活与文化。

世界历史性的视角

为了审视上述问题,我们需回溯到一些稍微浅层面的研究中去,即关于城市园林对城市生活与文化的贡献。为了避免先入为主的视角,我们研究园林的案例将涵盖从古地中海世界、宋朝及之后朝代的中国、土耳其帝国、安达卢斯(Al Andalus)统治下的阿尔摩哈德王朝、巴洛克时期的意

大利与法国,直到 19 世纪的美洲。这些案例都表明,园林能够对文化的诸多层面的改变起作用,并在对城市个性、文化与经济的保存上有着一个确定明晰的功能。

本书将从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案例入手,案例中所描述的城市在维苏威火山爆发(AD79)后被毁坏,并且完全被火山灰所掩埋,直到 18 世纪才被发现。威廉敏娜·雅舍姆斯克(Wilhelmina Jashemski)是第一位发现这座城市的考古学家,她试图系统地对这片遗迹与周边区域进行挖掘。她介绍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从根本上修正了一些关于古罗马世界的城市与园林的看法。在过去文献的记载中,自公元前 1 世纪以来,园林的建造与功用只是作为罗马别墅中奢侈生活的延伸而已,而且绝大多数位于城市之外。但雅舍姆斯克对于庞培城(Pompeii)的研究却暗示出园林占据着城市内的许多土地,如同公共道路和公共空间那般,甚至占据着整座城市将近三分之一的土地。园林对整座城市的结构和密度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在不同层面上影响着城市的经济、公众与私密生活,甚至与死亡也有着形而上的紧密关联。这些大小不一、形制与功能各异的园林构成庞培城中罗马生活的方方面面。雅舍姆斯克的研究表明罗马文化与城市园林的发展密切相关。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到与我们西方文化较为疏远的东方世界中去。乔治·梅泰理(Georges Métais)、奚如谷(Stephen West)和肯尼斯·J. 哈蒙德(Kenneth J. Hammond)做出了这样一个论证:尽管在中国和罗马之间有着诸多不同,尽管庞培城与那些在洛阳、开封和南京的园林的建造时间不一,但是这些园林对城市生活的影响与罗马的同样丰富多彩且至关重要。但更为有趣的是,梅泰理等人阐明了这一点,即中国园林对城市生活的贡献完全是中国所独具的,并就其对文化的改变和更新而言,中国园林表征着历史性的推动力。因为在洛阳,城市园艺的非凡发展是地中海周边国家植物选种培育所无法比拟的,洛阳花卉展中所展示的以及市民在审美欣赏中所呈现的城市文化生活,必须视为是世界文化的重大发明之一。这些文化推动力似乎建立在园艺的独创性的基础上,如同(市民在日常生活)炫耀性的挥霍上。

在另一方面,奚如谷对开封城市文化与公共园林功能的转变的研究,以及肯尼斯·J. 哈蒙德对南京市民建造城市文人园林,以作为寻求城市中远离纷争、安隅一方的场所的研究,都表明了中国园林与“城市生活的活力”存在着相互关联的诸多途径。在第一个案例中,作者通过阐明公众能够参与到园林建造过程中,来论述开放的皇家园林可以为公众提供一种全新的平民间交流的平台。而在第二个案例中,作者论述了私家园林的建造与使用,以此表明平民阶层中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内在区别。尽管本书中所探讨的园林种类千差万别,并且城市之间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但是我们仍可以通过这些园林,看到中国社会不同群体相互间以及内部交流所持有的新形式,而正是这些新形式,在较大程度上对社会所经历的变革起着稳定作用。

劳诺·玛格兰尼(Lauro Magnani)和米歇尔·柯南(Michel Conan)分别论述了与上述中国园林建造时间有一个世纪之隔的热那亚共和国的园林,以及17~18世纪的巴黎皇家园林。他们都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尽管城市有所不同,但园林的使用都毫无疑问地在形式、政治与经济条件层面上,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并且激活了某些新形式以促进社会中的互动。热那亚的金融寡头发明了园林城市并创造了商品交换。白天,在市中心,这些家族生活在忙碌而又具有竞争力的氛围中,晚上则抽身回到休闲化与富有贵族雅趣的园林中,特别是当他们款待从其他城市中来访的客人时,借园林表达他们优雅的生活方式。

在热那亚,建造园林是用来巩固该城市的银行信贷的经济霸权的,而园林本身也成为城市领导自我炫耀的资财。进而,这些园林将整个城市联结成一个整体,但这并未能弥补法国国王行使暴力的丑态以及随后城市形势的动荡不定。

而在同时期的法国巴黎,一连几任的国王纷纷将他们的园林向市民公众开放——有点像在中国的开封。五百年后,在园林之中的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教士、贵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得以新的发展。新观念、新做法、新文化通过园林的制度化,从而在两百年期间向前稳步发展。这种现象完全出乎意料,并且在18世纪让几乎所有的学者困惑不已。如同在热那亚

所看到的,园林生活极大地改善了城市形象,并促成城市与公民间对话的氛围。

最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与欧洲的所有案例当中,园林(的建造)似乎源于人们希望在其对自然的传统观念中去寻求某些新的实践,之所以这般,是因为园林(的建造)本身就是赋予自然一种文化的形式。新式园林为自然赋予某种形式,并以此论证园林中不同使用群体之间的某些行为和实践的合法性。这些论文所采用的案例涵盖中国、意大利、法国,并阐明了园林与城市文化生活改变之间所具有的惊人联系。无论在哪个层面,园林都为研究市民的社会互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而正是在这种互动中,市民对文化习俗的转变进行探讨、协商乃至激烈争论,从而使得所转变的文化习俗能够得到市民的普遍认同。就这点而论,园林堪称城市文化的大熔炉。

席琳·哈马德(Shirine Hamadeh)和罗伯特·罗滕博格(Robert Rotenberg)则从社会与文化变迁及其与自然相互联系等层面上,探讨了园林如何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上得以精细呈现的。两个相邻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和维也纳,由于其所属的两个不同帝国相互战争,使得这两个城市的园林建造陷入困境,并且这种困境持续到了伊斯坦布尔的整个18世纪,以及维也纳的19世纪前半叶。更为有趣的是,两座城市开创了两种不同的方式来促成城市园林的发展。在伊斯坦布尔,苏丹以及他的宫廷试图通过向市民开放园林和在园林中建造喷泉与咖啡屋来实现控制中产阶级的目的;而在维也纳,中产阶级也开创先河,以某种不受既定计划约束的方式去建造新的私家园林,以躲避国家在公共场所的政治控制。尽管上述两个案例都无法证明私人园林或公共园林能够履行明显的政治职能,但我们仍可看到,伊斯坦布尔和维也纳两者不同的园林文化,使得它们表现出一个共同特点,即新型的社会交往的习俗或仪式化的实践,能够建立某种新的生活方式,并有助于形成新的社会特质。以上这些都证明了园林能够加速创造城市中的市民文化。

公园与城市设计的开始

在 19 世纪,热心的几位园林评论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在精心策划下的公共园林和私家园林的健康发展,是城市实现广泛的文化与社会改革的保证。继约翰·克劳迪亚斯·劳顿(John Claudius Loudon)之后,英国、德国和法国相继出现了许多改革者。有些人做得更为激进,从而引发国际竞争。

第一部分的一篇论文,其所采用的案例取自 20 世纪之前,在该案例中,园林建设首次尝试应用在城市发展规划之中。大卫·斯凯勒(David Schuyle)阐明,某位著名的美国景观设计师为解决城市生活中最迫切的问题,即公园和园林的公共政策的问题,花费一年时间,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 1868 年,由于美国工业城市都在快速发展,因而出现了大量的贫穷与健康问题、交通问题、个人压力过重以及社会动乱。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即在整个市区和郊区中建立一个公园和公园道路的综合网络。这一建议在 20 世纪初期,被许多美国城市大范围地采用。这些问题及其提供的解决途径引起了当今世界所有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城市的极大兴趣。

不过,在公园和园林政策上,上述案例并非首创。事实上,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以下两个例子的启发,即受到英国利物浦附近的伯肯黑德城的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1801~1865 年)以及 1852 年的路易斯·拿破仑(Louis Napoléon)政变后吉恩—查尔斯·阿道夫·阿尔封(Jean—Charles Adolphe Alphand)发动的巴黎城市改革的启发。从此以后,在伯肯黑德和巴黎,园林在改善城市的生活方面似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奥姆斯特德认为 he 可以利用这些案例来改善美国城市的公共福利。然而,这一简单的想法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这些被英国一位非常重要的园林学家威廉·鲁宾逊(William Robinson,1838~1935 年)详尽阐明。根据其在法国的游历,鲁宾逊于 1869 年在伦敦出版了一本关于巴黎公园、游园与园林的著作,该著作与英国的城市特别是伦敦市的需求

密切相关,我们计划在本书中再版此书的绪论。在这里有必要引述一些开场白,这些开场白为城市园林规划以及借鉴国外城市的优点提供了理念与思路。它们还强调了一些现今仍常出现的难题:

没有必要对一个富裕而又文明的大城市中的良好的公共园林系统的必要性进行阐述了;也没有必要对其在我们现今情形下的稀缺性进行描述——我们面对着城市那些成百上千的华丽浮躁却苍白贫乏的城市园林,好比将活跃的大脑和心脏集中放在一个地方。伦敦不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民族的聚集点,这不言自明。我们其他伟大的城市几乎紧随其成长,但没有人可以看到一种善意去为他们的工人的生活和健康做出一个实实在在且有益的任何尝试,以便与这些人群密集的社区的需求相一致。^[10]

在对公园的需求进行确认后,鲁宾逊承认,虽然在伦敦已经有公园,但无法始终如一地满足全市人民的需求。“法国人有他们自己的公园和公共园林,而且面积非常广阔并得到良好管理,不过,与我们本国某些园林类似,其园林的建造借助了昂贵和柔弱的植物,而这些植物的种植明显浪费且不必要;但是他们种满树木的道路、小广场和公共场所,远远多于他们的公园和天竺葵属的植物,这样做使得市民从易引发瘟疫的过度拥挤中拯救出来,并且能够承担建造这些构筑设施的费用,除了某些区域以外。”^[11]

这引发的第一个问题:巴黎公园政策源于一位皇帝,即拿破仑三世的政策,他实行了一种与英国的传统与期望背道而驰的独裁政府制度。因此,鲁宾逊要求国会给予各个城市为公园、花园、长廊作发展规划的权力。这种公园规划的政治因素显然不可避免,它使景观规划成为公众讨论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如何对不同目标和项目的公共资金进行分配也应成为公众讨论的一部分。这正是鲁宾逊在他长达 644 页的书中所要阐明的:“非常希望我们在军舰库、陆军舰队和防御工事的庞大开支中,能够有一天拿出一部分用在城市生活的改善上。”^[12]这引发了“公众评判”这

一话题。鲁宾逊深知,尽管伦敦中央有宏伟的公园,并且得到了非常周到的管理,但是,这些公园只为少数有特权的人服务,它们的维修费用可以用来更好地服务于更多市民。因此,城市有必要在设计、种植、管理城市公园上考虑经济性:“在摄政花园(Regent Park)新的林荫大道公园里,有狮身鹫首的怪兽和人工雕凿的形体,它们所花费的成本足以在一些易爆发瘟疫的区域和东伦敦修建一整块绿洲。”^[13]他坚持认为,一个普通的城市政策不应仅限于市内公园的创立,而应更好地分布在城市的整片区域。街道要栽种树木,建造新的市政设施,并改善人们住所附近的交通状况。因此鲁宾逊认为,公园及海滨公园政策应作为城市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仅作为附庸而已,也只有这样才可以独立解决问题:“在伦敦某些区域和郊区某些比较拥挤的地方种植树木的创新举措,不应仅仅局限在那些人流频繁出入的街道之中,而是应尽可能突破这些惯例。”^[14]这显然是受到哈斯曼(Hausmann)对巴黎市区重建政策的启发,我们可以从斯凯勒的篇章中看到奥姆斯特德是如何将其适用到美国城市的。鲁宾逊接下来解释,这样庞大的计划需要设立公共托儿所和发展专业的园艺城市,而这些在英格兰都没有,尽管英格兰在园艺领域,如杂种树的种植及异质树种的栽培上有不错的能力。虽然,鲁宾逊清楚明白英国的园艺要超过法国的园艺,但他指出,这不能阻止英国人从比自己差的国家中学习一些专门领域的知识。^[15]鲁宾逊呼吁国人前往巴黎,自己去看看园林是否会带来更美好的生活,论文开篇第一章便将法国人所持的怀疑态度一扫而光:“在所有城市中,如果巴黎现在不是最明亮、空气最清新、最漂亮的城市,那么它也即将成为这样的城市;而巴黎最漂亮的地方就是它的园林和树木了。”^[16]

公园与园林设计的两难

本书的第二部分主要是介绍 20 世纪以来不同城市 and 不同国家的海滨公园、娱乐政策。有些文章所介绍的一些案例,以及案例的局限性方面,比起鲁宾逊——他主张别国应该仿效巴黎奥斯曼的城市美化政

策——的论述更为详尽。而其他的人则认为,现今有些城市如果完全没有公共政策的指导,将可能导致一些严重的问题,而过去之所以没有公共政策的指导城市活动也可照常进行,往往源于它们以往的卓越成就,即在一个广阔的领域内,城市活动与园林维持了某种比较显著的均衡。这些正是值得政治决策者和规划师考虑的有趣问题。

托布约恩·安德森(Thorbjörn Andersson)阐述了20世纪中叶在斯德哥尔摩市制定和执行的卓有成效的公园、海滨城市的政策。比鲁宾逊优越的是,安德森详尽地阐明:在实施公共福利改革中,城市园林可作为一个基本手段。他说明了在公园规划方面瑞典是如何为大城市中市民文化的发展贡献了一个更加开放的政策。安德森还阐明,斯德哥尔摩的海滨公园如何被构思成为瑞典现代化精神与文明的工具,以及它们如何尝试将一个充满等级和虐待的社会导向至一个平等进步型的社会。但同时安德森也描述了与之相对的政策的各项特征——在一个有着光明前景的平等的社会里,如果公共管理者存有“独裁”的行径,其结果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斯德哥尔摩市的公园仍在使用,而且为人们所欣赏,但仍然可能被人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只是实现了原初设想(独裁的公共管理者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译者注)的目的罢了。

尼可拉斯·达根·布鲁姆(Nicholas Dagen Bloom)所关注的案例涉及美国最主要的60个新城市,如哥伦比亚(马里兰州)、FGDC(维吉尼亚州)、埃尔文(加州),案例证实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观点,即希望通过一个新的园林和公园政策的执行,就改变城市生活的计划的做法似乎既无所谓成功,也无所谓失败。如同斯德哥尔摩学派的公园规划者一般,在这60个新城市中,美国的景观规划者希望在市民和自然之间发起一场依据南北战争奴隶解放后所预言的文化变革,一种对自然应该负起的责任。因此,城市园林的文化目标和景观方法显然不同于瑞典人。

美国人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与农业景观所表现出来的关注,是为了在美国郊区居民中建立一个新的自然道德规范,而不是仅凭借美国荒野来抽象地表述一个为追求平等的理念而已。布鲁姆指出,在城市建成后很久,尽管大片空地用于自然保护,并且当地社团和文化团体也积极致力

于介绍都市人对大自然所阐发的评论,但是,每年在公共景观区和城市人行道里的行人仍然稀少。他提出了一个有启发性的评论:“一个犯罪、绑架、青少年犯罪少的社会,会发现市民在居所周边的自然区域所受的威胁较小。”

该评论之所以具有启发性,是因为它帮助我们理解城市公园规划的局限性。它表明了文化变革与美国公民之间存在着互动,而这种互动仍不可被城市规划者所预计和改变。类似的观点也适用于斯德哥尔摩的情形:社会民主党规划者未曾预计的是,尽管他们的结果得到大批人的赏识,但是这些带着良好意愿的政策却由于他们的“独裁”政见而受到抨击。不过,在这两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园林规划者能够正确地预测未来使用者对自然的兴趣和态度,而非瑞典中世纪和美国20世纪后半期那样。这为大批市民在园林里交流和相互影响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这些活动是由市民自发组织的。集体交流和个人选择彼此加强,并不断促进新的问题的产生,并借此促进市民与自然的接触。例如我们知道,美国新城镇中许多优美风景的人工湖景观并不能离开人而独立维持。从而,维持一个没有污染的自然界将会遇到不可预知的困难,这反过来又使许多人团结在一起为之奋斗。努力维持水质被看做是环境质量的标志,并且自然与园林使用者以及使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应考虑进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城市事实上被建设成为一个对当前荒野能起到保存作用的公共园林,这是观念的转变,而这种观念的转变能够使人们团结在一起,而这又取决于自然环境本身及其所处的文化和政治环境的改变,以上便是园林规划者的原初本意。这些园林政策的成功,部分是因为当地成群居民参与到对园林建设的相互交流。但是,同样的互动做法对新的实践活动、自然遗产继承和预期城市生活的文化也起了作用,而非之前一味盲从规划者的初始目标。

接下来的两篇文章,为我们对园林和城市的研究带来了更重要的论述,这些文章警示我们应面对肆意毁坏园林所带来的危害。埃里克·J. 赫吉拉(Eric J. Heikkila)和穆罕默德-埃-法耶兹(Mohammed El Faiz)提醒我们关注两个城市,即北京与马拉克奇(Marrakech),几百年来,它们各自

具有丰富优美的园林环境,但为了城市现代化的建设却忽视乃至摧毁了它们。赫吉拉的主张偏向于理论层面,而埃-法耶兹则更注重园林环境遭受破坏的进程中的历史层面。之前布鲁姆已经论述了这一观点,即在美国新城镇建造可持久的荒野的尝试可能性很小,但更有趣的是,阿莫拉维德统治者 900 多年前所创造的人工绿洲却一直能延续到 20 世纪中叶,这使得马拉克奇市在 800 年间一直被大棕榈树绿洲的独特混合林所环绕。埃-法耶兹解释了在何种政治体制之下,人们能够有组织、有意识地建设人工绿洲,以及在何种情形下,人们会为麦地那(Medina)这个传统的市中心的发展创造条件。埃-法耶兹还指出,从 1912 年法国摄政政体到现在,由于城市规划的新途径和经济发展的原因,外来移民被允许进入城市并不断侵犯麦地那(Medina)城市周边的园林,因而破坏了城市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并破坏了维持绿洲的水压系统。埃-法耶兹当然赞同赫吉拉的观点:城市和园林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日常生活文化,但埃-法耶兹仍坚持:在经济条件完全改变的情形之下,公共机构和政治领袖在寻求新的生态经济模式的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许亦农(Xu Yinong)以及 S. 博苏(Sylvie Brosseau)在各自的文章中很好地表述了城市中文化连续性的论题,在这些城市中,如同目前的马拉克奇,城市居民与其园林中存系着一种极为美妙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却正在逐渐瓦解之中。这些城市园林尽管建造在同一时期,但是它们对于城市文化的贡献却有所不同。在对 20 世纪苏州古典园林保存的研究中,许亦农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就西方的专家学者而言,通过物质形式维持连续性的方式来实现城市文化的保存,可谓是一种普遍规律。此外,许亦农还表明,通过维持苏州古典园林这一物质形式的连续性,一方面,保存着城市的精英文化并促成其持续的变革与深入;而另一方面,保存着城市中的大众文化,而市民在欣赏园艺时所获得的愉悦感恰恰孕育在这种大众文化当中(就此,乔治·梅泰理在前面进行过论述)。

S. 博苏通过一种类似的行文风格,讲述了东京地方环境保护主义者与政府当局之间的互动作用已经导致了新形式的城市园林的发展——在这些园林中,古老的文化习俗能够与新的日本生活方式与时俱进。在城